

#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创性贡献\*

张 旭 郭义盟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创造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形成了深具原创性与时代价值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创性贡献。这些原创性贡献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又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关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制度的优化与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入阐释、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创造性阐释,破解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中的长期理论难题;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分配制度创新,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原创性论述,界定了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作用的边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战略性指导。

**关键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两个毫不动摇” 分配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核心,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高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和创造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变革。

当前,如何深入理解和有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论述,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迫切现实需要。而系统地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原创性贡献的理论研究,深刻揭示其原创性与时代性价值,可以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全新的视野与有力的理论支撑。具体而言,可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经济治理现代化这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成要素的全面性、系统性把握。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与市场机制三个关键维度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出发,形成内在统一的理论体系;而经济治理现代化则上升至治理效能层面,体现了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递进关系。这种结构安排既明确区分了制度本身与制度运行之间的理论层次,又充分揭示了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制度体系核心对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

[作者简介] 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北京,100836,邮箱:jjs-zhangxu@cass.org.cn。郭义盟(通讯作者),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成都,610071,邮箱:gym993@126.com。

\*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批准号:DF2023ZD20)资助。

## 一、“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创新

“两个毫不动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具有发挥各自作用的领域和优势,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可缺少的基本所有制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历经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单一公有制经济再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演变,最终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这一重大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两个毫不动摇”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创新,不仅明确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各自的战略定位,提出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 and 民营企业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等创新理论,更强调了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

### (一)“两个毫不动摇”的确立过程

我国所有制制度中“两个毫不动摇”这一原则的形成,是实践和理论相互促进的结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明确提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成分,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鲜明地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sup>①</sup>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应对中国的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推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方针。1949至1955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恢复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逐步形成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合作社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等多元经济成分协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这些经济成分之间形成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良性互动关系,既适应了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又有效满足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求,最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稳步增长。

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赎买民族资本构建了全民所有制经济;通过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工商业,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结束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公有制经济的全面建立和地位确定,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制度基础。党和政府能够充分调动社会资源,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广大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在生产过程形成了平等互助协作关系,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参与企业经营、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的自主性与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加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正在探索之中,国家制度设计与现实的社会发展出现不协调,在1957年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一大二公”被绝对化为衡量生产资料所有制先进性的唯一标准。在此理论指导下,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终形成了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的单一公有制格局,导致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形态几近消亡。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个体经济的兴起,使中国所有制结构开始发生变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sup>②</sup>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法律规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sup>①</sup>在政策扶持与法律保障的双重推动下,中国个体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期。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后,改革浪潮从农村向城市全面铺开,国营企业改革、工资制度调整、流通体系变革、财税体制优化、农产品收购价格改革以及外贸体制创新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相继启动。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已基本构建起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的新型经济格局。此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党的十五大最终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sup>②</sup>并于1999年被写入宪法修正案。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明确提出了“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方针。这个方针是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根本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得到坚持和完善。由此,所有制结构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sup>③</sup>

## (二) 习近平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地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指引中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定位与企业制度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sup>④</sup>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不仅要,而且一定要办好,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充分发挥其作为政治可靠主体、政策执行中枢、改革创新引擎、战略实施载体、经济社会发展支柱以及国家竞争优势保障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度融合,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即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同时,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实现治理能力和政治优势的深度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企业治理新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sup>⑤</sup>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这一制度的创新性体现为:通过将党组织法定化嵌入公司治理架构,在治理层级、权责配置、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中系统性地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企业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思想观点。首先,明确民营企业“自己人”的政治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的观点,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地位、作用,明确提出要消除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歧视和障碍,大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一创新论述从思想和理论层面破除了对非公经济的误解与歧视,推动民营企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其次,首次明确提出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两个健康”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两个健康”理念,从企业成长和企业家成长两个维度,强调党的领导和政策引导的同时,强调民营企业自身规范发展、增强社会责任、维护公平竞争、提升治理水平,形成了全新的理论维度和政策着力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252、1725页。

④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96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页。

最后,提出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政策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提出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鼓励民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等一系列综合性政策举措,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思想从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重新界定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了二者共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内在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亮明态度、决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sup>②</sup>“两个毫不动摇”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所有制界限的僵化认知,以制度创新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现代经济治理格局。

## 二、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创新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sup>③</sup>分配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直接组成部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经历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则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创新观点,不仅坚持并完善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基本制度架构,还在健全要素市场机制、拓宽收入渠道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从而为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导和制度支撑。

### (一) 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演进历程

1949年后,中国逐步构建起与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体系。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方面,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随着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原先多元化的所有制经济被逐步整合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城市工商业领域确立国家所有制,农村则普遍建立集体所有制,这种公有制结构为按劳分配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所有制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在分配机制设计上,形成了城乡有别的具体实现形式。城市国营经济部门实行等级工资制,并辅以住房、医疗等福利保障作为补充性分配;农村集体经济则采用工分制,主要采取实物分配形式,现金收入则占比相对较低。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确立并深化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导的收入分配体系。首先,1978年后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改变了之前的工分制分配模式,确立了“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新型分配机制,形成了“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的制度安排,<sup>④</sup>重塑了农村收入分配格局,使农村分配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次,国家通过实行工资总额挂钩、分类分级管理等手段,打破了原有的僵化分配模式,城市工资制度改革逐步深化。企业开始试行浮动工资制、结构工资制等新型分配方式,

<sup>①</sup>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第321、442、170页。

<sup>②</sup> 习近平:《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求是》2022年第24期。

<sup>③</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sup>④</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使收入分配更加灵活多样。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sup>①</sup>在制度层面确认了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合法性,为后续分配制度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1992年以来,中国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992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个人收入分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sup>②</sup>标志着我国分配制度正式突破单一模式,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这一制度创新使多种分配方式从“补充”地位上升为基本的制度构成。1997年党的十五大创造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sup>③</sup>确立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操作依据。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按贡献”分配原则,使分配制度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sup>④</sup>将分配原则提升为制度安排,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分配制度体系。这一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

## (二)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行了系统性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这一思想体系不仅为破解新时代收入分配领域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方法论指引,更通过将分配正义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范畴,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范式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整体制度设计,体现了规范初次分配与健全再分配并举的思路。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sup>⑤</sup>“知识”被列为生产要素反映了知识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的趋势;明确提出由要素市场决定要素报酬与要素市场的完善相适应,有助于更好实现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价值的实现,促进要素自主有序的流动与高效公平的配置。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概括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sup>⑥</sup>其中,“数据”被列为生产要素反映了数字经济发展中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在生产方式变革、生产效率提高中的突出作用。

收入来源多元化是居民收入增长演变的内在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sup>⑦</sup>鼓励工人在赚取劳动报酬的同时获得分红或股息。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sup>⑧</sup>这一要求既适应于按要素分配制度,激励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领域,使要素所有者获得更多要素收入;还适应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使得工人或农民也能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

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以“人民共享”为价值内核,将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保障目标,嵌入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从制度层面来看,只有通过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8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732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37页。

⑥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第355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15页。

⑧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第465页。

建具有系统完备性、运行稳定性的公平型收入分配制度体系,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根本性制度支撑。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将共同富裕确立为制度设计的核心价值导向与评价基准,在社会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中贯彻分配正义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sup>①</sup>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时代深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转型的历史进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持续增强,政府职能和经济管理方式逐步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需要,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原创性论述,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入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并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时代深化与创新发展。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历程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经营下的“吃大锅饭”,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4年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便达到阶段性高峰。<sup>②</sup>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解放了农民,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为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进城务工奠定了基础。1985年,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商品化率大幅提升,农村经济更加活跃起来。与此同时,计划定价(合同定购)和市场定价(合同外)的“双轨制”将市场机制逐步引入,农产品价格渐次放开。到1993年,大多数地区取消了合同定购任务,实现了价格“双轨制”,向市场定价“单轨制”的转变。与此同时,在城市有企业开始“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并以价格改革、市场机制改革、宏观经济管理改革等为支撑。通过“调价”与“放价”相结合,不断扩大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建立和发展市场体系。<sup>③</sup>在这一时期,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包括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在内的市场体系开始形成。

1993至2002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构建和制度体系逐步确立的重要时期。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具体而言,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采取“抓大放小”举措,深入推进政企分离的改革,明晰企业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促使其发展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在财税体制方面,1994年建立了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统一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内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制度。在汇率制度方面,建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行银行结汇和售汇制,实现汇率并轨。在社会保障方面,变革以企业为单位的职工退休养老体制,推行省级统筹的养老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在住房制度方面,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形成满足多层次需求的市場型住房供应体系。<sup>④</sup>这一阶段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1993—2002年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从1115.7万人增至4267.5万人,乡镇企业数由2452.93万个减少到2132.69万个,其中集体性质的占比从6.9%

①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第97页。

② 聂英:《中国粮食安全的耕地贡献分析》,《经济学家》2015年第1期。

③ 许经勇:《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曲折历程》,《南方经济》1997年第5期。

④ 李剑阁:《回首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政策与管理》2000年第1期。

降至 3.4%；而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由 12345.31 万人增至 13287.71 万人，其中集体性质的占比从 46.7% 降至 28.6%。<sup>①</sup>

2003 至 2012 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的阶段。党的十六大之后，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绝大部分完成股份制改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政企分开、投资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形成。2003 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200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非公经济 36 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sup>②</sup> 2010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非公经济 36 条”）提出，“市场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要公开透明，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sup>③</sup>“非公经济 36 条”和“新非公经济 36 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民营经济在规模上快速发展。

## （二）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认识和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系统深刻的阐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sup>④</sup> 这一重要论断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得到制度化确认。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表述转变，虽仅两字之差，却标志着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预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制度效能维度看，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旨在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构建有效市场；而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则体现政府在经济治理中的精准定位和适度干预，形成有为政府。这一理论创新要求我们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配合，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依据，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中，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深刻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资本形态呈现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和混合资本等多元化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精辟论述：“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sup>⑤</sup> 这一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治理的新范式：一方面要科学认识各类资本的客观存在及其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资本运行的内在规律，构建起既充分发挥资本要素功能又有效防范其负面影响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这一思想要求我们以辩证思维看待资本问题，既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确保“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又要明确“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sup>⑥</sup> 在具体实践中，这一理论创新体现为三个维度的制度设计：一是建立资本分类治理机制，“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3、147、447—44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84—694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59—668 页。

④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 1 卷，第 76 页。

⑤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 1 卷，第 441 页。

⑥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 1 卷，第 448、441 页。

上要明确”；<sup>①</sup>二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sup>②</sup>三是健全市场监管体系，通过反垄断、反暴利等举措防范资本野蛮生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构想，为新时代推进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一论断确立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定力与行动方向。在制度创新层面，我国通过构建“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施系统性放宽市场准入政策，推进服务业更深层次开放，同步完善外商权益保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国内大循环与高水平开放的辩证关系：“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sup>③</sup>这一战略思想要求同步推进两个维度的开放深化：在要素流动层面持续优化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跨境配置效率；在制度规则层面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 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优势的实现形式和实践创新

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治理体系历经了从高度集中计划管理到市场化、多元化治理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反映了经济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完善，更体现了党和国家在适应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过程中，主动调整治理策略与方法，以增强治理效能、回应社会诉求的持续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并系统阐释了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将其明确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强调要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的创新性论述为我国新时代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坚实支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时代活力。

##### （一）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演进历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济制度重构呈现出鲜明的制度建构特征，其核心在于通过顶层设计实现经济基础的系统性重塑。面对旧中国遗留的脆弱的经济基础，执政者选择以苏联经验为参照系，构建起“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设计的战略考量在于：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实现经济资源的高度集中，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提供制度保障。在制度转型的路径选择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成为制度构建的关键，农业合作化运动、手工业集体化改造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政策，共同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态的根本转换。这一进程不仅体现着新生政权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改造，更折射出特殊历史条件下对苏联经济治理方式的路径模仿与依赖：在财政资源有限、行政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背景下，通过意识形态整合与社会动员机制实现治理效能的超常规提升，形成上层建筑主动形塑经济基础的制度创新模式。

改革开放后，传统计划管理体制与市场化激励机制间的内在矛盾日趋显现。为适应市场化改革对治理体系提出的要求，国家治理开启了以央地关系调整为核心的系统性转型。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财政包干体制，标志着中央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资源控制向间接宏观调控转型的初次制度尝试。通过财税分权激发地方发展动能的同时，这种“分灶吃饭”机制在实践层面催生了央地博弈的新格局——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扩张虽激活了区域经济活力，却导致国家战略资源统筹能力的结构性弱化，形成了“地方竞争有余而中央统合不足”的治理困局。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启动，实质上是国家

<sup>①</sup>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第451页。

<sup>②</sup>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第451页。

<sup>③</sup>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第270、398页。

治理体系对市场化演进作出的适应性调整。这一财税体制改革催生了地方政府与企业改革间的激励相容机制:当企业所得税成为地方主体税源,企业的经营绩效直接转化为地方财政收益,这种制度设计倒逼地方政府主动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经营机制转换。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制度性崛起重构了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体制外就业群体规模扩张、收入分配格局多元化以及转型期失业压力,共同推动社会保障制度从单位福利向社会化供给的制度性重构。

2001年底,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现了经济治理范式的战略性跃迁。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性开放,标志着国际大循环战略进入深度整合阶段,由此触发经济增长动力系统的结构性转换:国内经济主体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制度性赋能,市场化改革中孕育的现代企业群体加速融入跨国生产体系,使得出口导向型产业集群、跨境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网络共同构成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种制度型开放引发的连锁反应,促使国家治理体系向科学化、系统化方向加速转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基础变革与上层建筑调适呈现出显著的协同进化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适应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中重塑倒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升级又为市场机制完善提供制度保障。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sup>①</sup>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 (二) 习近平关于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全局,创造性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治理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创造性地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sup>②</sup>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直接决定国家治理效能的提高,进而为经济治理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时代视角与理论高度,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理论的原发性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紧迫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各方面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持续健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书写了经济发展奇迹新篇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up>③</sup>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728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22年版,第1128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要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推动经济治理的实际效能。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历经70余年制度演进,已形成具有显著优越性的制度体系,其关键在于通过党的领导实现制度势能与治理动能的动态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多下功夫,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sup>①</sup>强化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既是提升经济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的集中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sup>②</sup>这种制度逻辑体现为双重实践指向:一方面,通过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转化为科学决策效能,确保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治理目标的高度统一;另一方面,将全面从严治党深度嵌入经济治理全过程,使正风肃纪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保障。

## Xi Jinping's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alist Basic Economic System

Zhang Xu, Guo Yimeng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ars direct implications for th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conducted systematic and creativ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regarding the socialist basic economic system, formulating significant original propositions with contemporary value that constitute Xi Jinping's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alist basic economic syste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Thes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not only inheri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but also achieve groundbreaking progress in addressing cruci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rticularly in the following domain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of the economy; the optimization of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and advanc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goals; the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 unde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The creativ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Unwavering Principles” resolves long-standing theoretical dilemmas in public-nonpublic economic relations; the common prosperity-oriented innovation in distribution systems clarifies the fundamental value orientation of socialist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the original expositions on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 delineate the boundaries of market decisive roles and government functions, deepening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s in modernizing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provide strategic guidan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ing national governance.

**Keywords:**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Two Unswervinglys”, Distribution System,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Modernization of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特约编辑: 龚云)

<sup>①</sup>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3日,第1版。

<sup>②</sup>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第5页。